
望族文化：明代江南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盛诗澜 蔡爱国

明代江南地区重要艺术家不胜枚举，其艺术成就涵盖文学、绘画、书长，戏曲、园林等多种艺术门类。此中望族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且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梳理明代江南地区家族文化与艺术的关系，无疑能更好地理解此时期的艺术繁荣，从而更深入地把握艺术发展的规律。

一、望族文化对艺术的重视与促进

一是以重教育、重科举为前提，二则望族往往更加注重家族成员综合文艺修养的整体提高。明代中叶，无锡当地流传着“安国、邹望、华麟祥，金银日夜用斗量”的民谣，这三大家族中，邹、华二氏为当地历史悠久的望族，安氏则为明代新生家族，情况各不相同，而都表现出相近的望族文化特色。三家都富而好诗、好艺、好礼，都曾出过众多名宦，但更诞生了一批青史留名的艺术人才。以邹氏为冤：邹氏本是一个科举世家，自南宋庆元二年（1196）诞生第一个状元邹宣龙以来，这个家族始终人才辈出，入仕为官者代不乏人。明万历年间，邹氏有“三光”之耀，即兄弟三人连中举人，二人中进士；此后，又有邹龙光一门连续八世出了八位进士之盛事。号管如此，邹氏子弟却往往并不以宦名显赫，而是以才华横溢而著称。如邹氏三光之一邹迪光，万历甲戌（1574）进士，仕途不显，但以诗文著名海内，其画艺高超，又称一代名手。不仅如此，他还精音律，擅衡鉴，好慈氏，会治园，其所构愚公谷至今仍是江南名园。邹迪光之子邹德基，负不羁之才，工诗文书画。而三光中的另一位邹龙光一门，其孙子邹式金和邹兑金是著名的戏剧家、作曲家。邹兑金的后人则多擅绘画，历代所出邹显吉、邹卿森、邹士随、邹一桂诸位，均是留名画史的人物。尤其是邹一桂，雍正五年二甲第一名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颇有政声，但其宦名却完全被画名所掩，以至在一些画史中竟被误认为仅仅是位宫廷画家。

二是将文学和艺术做成一种望族事业，甚至一种公益事业。如果从某些望族成员个体的角度来考量江南望族文化中“重文艺”的倾向，自娱自乐可以成为一种理由。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当一代又一代的望族成员从事同一类自娱自乐式的文化项目时，“文艺”就逐渐被做成了一种望族事业。江南很多家族都有收藏古玩、收藏图书的传统，其中一些望族成员还在收藏的基础上从事刻书与刻帖。收藏、刻书与刻帖本来都属于自娱，是一种“雅好”，但望族世家依靠家族不凡的财力与代代相承的毅力，却往往将这一雅好做成一种事业。如无锡的华家与安家，都以金属活字刻本而留名印刷史，华隧“会通馆”、华坚“兰雪堂”、安国“桂坡馆”所印铜活字书籍在当时均赫赫有名，以精良见称。刻书之举在家族成员来说不过是自娱之雅好，往往不以赚钱谋利为目的，但在客观上保留和传播了大量珍贵的古籍，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成为一项文化壮举。在刻书之外，很多江南望族还致力于刻帖。如无锡华氏的华中父，依据所藏历代法书刻成《真赏斋帖》三卷，被誉为“明刻帖第一”。苏州文家的文徵明父子经营数十年，刻成《停云馆帖》十二卷，在明代诸帖中惟《真赏斋帖》能出其右。刻帖的初衷，同样只是自娱，并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使所藏法书名迹得以更完好地传之后代；但客观上，通过刻帖拓本的流传，前代法书经典能够普及、深入于民间，并有利于促进当时书坛水平的整体提高。因此，刻书也好，刻帖也罢，江南望族对文艺的偏爱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将之做成了一种家族事业，并且起到了造福社会的良好效果，成为了一种公益性的文化事业。

江南望族普遍都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积累，这种文化素质的积累，是经过家族人才的累世涌现、代代传承而实现的。明代江南地区的望族世家，通过营造这样一种热衷艺术的文化氛围，建立了无形的标准，形成了独特的场域，使江南地区成为了艺术的高地。

二、望族教育与艺术人才的培养

一是对家族子弟早期文化教育的重视。望族子弟开蒙时间一般都比较早，故往往能在年幼时就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多有神童之誉。如徐有贞“年十二三人小学，已能古文词，颖敏殊甚，卓然出诸生上”。祝允明五岁能作大字，九岁能诗，十岁博览群书。蒋焘五岁能诵小学，八岁读毕四书，十一岁能作文，十四岁应南宫试。陈继儒五岁成诵，六岁入小学，九岁能诗，十岁毛诗书义皆通达，十七岁便可博综六籍百家。袁褰五岁知书，七岁赋诗，十五岁驰名场屋间。王穉登四岁能属对，六岁即擘窠大字，十岁能诗，长益骏发。这里列举诸多的例子，并不是强调这些人的天资聪颖，而是要看到家族为他们的早期教育所提供的条件，毕竟是家族让他们在年幼时便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优质的启蒙教育是名门望族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有助于家族子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今后更为深入地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望族内部拥有优良的师资条件。望族世家家族成员整体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承担了教授的责任，化身为家族的优良师资。对于很多望族子弟而言，高水平的家族教育无处不在，无需特地去学堂获得。如蒋焘系武功伯徐有贞的外孙，五岁时由其母亲徐氏口授小学，这种教育条件可以说得天独厚。又如邹迪光，精通音律，能够亲自教优童拍曲，甚至直接参与昆曲剧作的排演。因此，其子邹德基，侄子邹式金、邹兑金得以从小随之学习音律。邹式金、邹兑金后来成为著名的戏剧家、作曲家，家族教育功莫大焉。除此而外，有些家族还设有义学、义塾，由族中长者授课教学，方便族中子弟接受教育，如无锡华氏。有时，家族义学的招生面会扩大至乡里，福泽桑梓，如无锡谈氏家族的谈恺，就曾在家中设私塾授课，并培养出无锡历史上的第二位状元孙继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望族世家师资力量强大。

三是超越功利、注重全面修养的教育理念。从江南地区各家族谱、族训来看，文化教育并不仅仅被作为科举入仕的手段，更被视为家族子弟陶冶性情、提高文化修养的必修课。这种超越功利的教育理念，对于家族艺术人才的培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无锡陡门秦氏宗谱》家训在劝勉子弟多读书时说：“三曰勤读书，变化气质，陶淑性情，惟典籍是藉。操之在己，达之在天，勿恃富而惰学，勿不第而丧志，勿以困苦而辄止，勿以明敏而荒疏。苦心力学，自能达其道而行其志。”秦家在无锡各大望族中，以科举之盛而独领风骚，明清二季共中进士34人，举人77人。但其家训中倡导子弟读书，竟然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变化气质，陶淑性情，这充分体现其家族文化的高明内涵和开阔眼界。读书是如此，其余艺术修养也是如此。明代昆曲盛行，秦家也参与其中。秦宝瓚在《寄畅园志序》中说：“南曲之盛，由昆而苏，由苏而锡，实萃于吾家。”秦家历代所出收藏家、书画家也不胜枚举，至晚清秦祖永不仅画艺高超，更有《桐阴论画》、《桐阴画诀》、《画学心印》问世，是著名的画学理论家。这些人物和成果的出现，跟家训的指引显然有直接的关系。

四是衣冠相望、积淀深厚的文化氛围。文徵明曾在《相城沈氏保堂记》中这样说：“诗书之泽，衣冠相望，非积之不可。而师资源委，实以兴之。”望族文化底蕴的积累非一时之功，需经历数代乃至数十代族人的共同努力，积累丰富的望族文化遗产，由此才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被文徵明称为“衣冠相望”的沈氏家族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例。位居“吴门四家”之首的沈周，为明代画苑一代宗师，能“以布衣之杰，隆望当代”，与其“家学相传，前辉后光”的望族文化氛围大有关系。其祖父沈澄能画善诗，所交皆文人士。父亲沈恒、伯父沈贞，皆有名当世，前者之画“虚和潇洒，不在宋元诸贤下”，后者“画师董源，可亚刘延美”。沈周的庶弟沈幽也善画，又其子沈云鸿，其孙沈泥，“无不诗文书画兼擅，家学承传不绝”。陈颀《同斋沈君墓志铭》说：“父子祖孙相聚一堂，商榷古今，情发于诗，有倡有和，仪度文章，雍容详雅，四方贤士大夫闻风踵门，请观其礼，殆无虚日。三吴士大夫世族咸称相称沈氏为最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不要说家族子弟，连沈家的仆人也都能被熏陶得能诗善画。杨循吉《题沈翼南画》绝句中“相城文物名家沈，厮役皆能画与诗”之句，就充分说明了望族文化氛围对于文学艺术的积极影响。

三、望族文化交流对艺术创作的强化

一是文艺交流活动的日常性。文化世族之间的文艺交流活动体现出非常清晰的日常性特征，它们是望族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地区，很多名门望族都热衷于建筑园林，在其中莳花木、酬宾朋，在觞咏娱乐间，诞生众多文学、艺术的佳篇名作。像无锡安国曾造西林园，“暇则挾友徜徉其间，时而酒酣兴剧，乃取李白远别离、蜀道难等篇、苏长公赤壁诸赋歌之。音调清远，流风洒洒，四座悄然倾听，如神游崑阆不自知其在尘宇”。与安国交好且往来甚密者，有无锡华察，吴门沈周、

文徵明、唐寅，彼此留下诗文传世；至其后代安绍芳时，名士王世旋为作《安氏西林记》，称：“而懋卿故有客癖，客之以文事名者又雅慕懋卿，以故争糜集焉……载酒崇肴，或凭鹿车，或鼓渔刀，相与穷昼夜为娱乐。”著名画家张复为画《西林园景图册》，存世至今。再如无锡秦金曾造家族宅园“凤谷行窝”，无锡邵宝及苏州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均有诗文记之；后秦熠在其基础上拓展修筑寄畅园，无锡高攀龙、安希范、安绍芳、邹迪光等望族子弟又纷纷为之作诗文以记。明代“松江派”画家宋懋晋为作《寄畅园 50 景图册》；至清初，著名画家王翚又为作《寄畅园十六景》。明代时，寄畅园与邹迪光的私人宅园愚公谷一样，是重要的昆曲表演场所，邹、秦二氏与当时的戏剧名家汤显祖、屠隆、冯梦祯、潘之恒等均往来密切，两家在招待宾客时，都会表演昆曲以作招待。由此可见，伴随着文艺创作的各种文艺交流活动，完全贯穿于家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明代江南名门望族的生活呈现出艺术化的特征，当时的艺术作品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蓬勃生机。

二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随意性。望族文艺交流活动的日常性特征，使很多文学艺术作品的诞生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随机性。从明代吴门书画家存世作品来看，有很多都是即兴创作的产物，《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二册所载《明文徵明人日诗画卷》即是典型一例。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初七日，文徵明的友人朱存理、吴灌、钱同爱，弟子陈淳及陈淳从弟陈津，齐集停云馆中，谈燕其欢。徵明作诗并画，朱存理等赋和诗。是日另有几位朋友约好未至，事后又有追和诗。这些望族子弟之间极其自然随意的文艺交流，使得随兴创作的艺术品在明代书画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乘兴之作与职业书画家的正式创作相比，在艺术情趣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别。又如无锡博物院藏祝允明《草书唐宋词卷》，为国家一级文物，情酣意畅，神采飞动，艺术价值极高，但其实也是一件随兴作品，而并非正式创作。卷末虽有祝允明名款，但既未书年款，也没有铃祝氏印章。从跋文可知，祝允明去陈淳家中做客，陈淳拿出祝氏三十年前为他人所书宋词，要求改以草书创作。祝氏写完，发现纸尚有剩余，又补以李白菩萨蛮词。整个书写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是一本正经的艺术创作。除此而外，家族姻亲、师友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也是明代书法中的一大景致。这些尺牍信札所谈内容不过日常小事，往往因送信人在旁等待而草草写就，匆匆不暇细究笔法、章法，但姿态翩翩，自然流畅，总有可观之处。

三是望族文艺交流的互补性。不同的家族一般都有各自不同的望族文化特性，有的雅好收藏，且家境富裕，有的鉴赏能力极高，却无力购买。即使同样家富收藏，其收藏的内容也往往各有偏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望族之间的文艺交流，可进行资源共享，互通有无，从而带动整个地区望族成员整体艺术素质的提高。像文徵明父子书画鉴赏眼力极好，但与富豪相比，购买力较弱。因此，当时的很多收藏家都会邀请文氏父子来家中鉴定藏品，并留下题跋；而文氏父子则借以开阔眼界，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鉴定能力。无锡华夏《真赏斋帖》所刻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及王氏一门《万岁通天帖》，就都经文徵明鉴定作跋。文徵明长子文彭过华夏真赏斋，曾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是日，绿阴清昼，庭无杂宾，新茶初熟，尽阅所藏法书名画，恍然不知有身外事。”这段话清楚表明，望族之间的文艺交流带有极大的互补性。华夏通过文氏父子的题跋提高自己藏品的地位和品质，而文氏父子则于其丰富的书画收藏中获得了艺术上的提高。1530 年，文徵明次子文嘉于鬻书人处获得见三卷《淳化祖石刻法帖》，文徵明知道华夏已经藏六卷古本，质量极高，而华夏“以不全为恨”，“函报中甫以厚值购得之”。文徵明知吴门史氏亦藏一卷，“华得其九，史得其一，文待诏为之和会，两家各称好事，连城不吝，延剑终乖，其难致如此”。虽然和会之事并未成功，还是堪称一段收藏史上的佳话。各大家族依靠自己在经济、文化、艺术上的实力，优势互补，促成了江南文艺的整体繁荣。

（作者单位：盛诗澜，无锡博物院；蔡爱国，江南大学人文学院）